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30期 民國88年5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30, May 1999

EJ095199930021

# 沙學浚先生歷史地理學之理論綱領 **Theoretical Outlin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iewed by Professor Hsueh-chuen Sha**

王爾敏\*

Erh-min Wang

## 一、緒言

中國自古重視地理，尤其重視歷史地理，早有豐富經驗，巨量著述，傳布後世。此是人人共喻，不待舉證，無須詳論。

以歷史地理領域而論，自《漢書》地理志以來，歷史名家著述，其用心俱多集於沿革地理一面，形成歷史地理學的主流風格。其內涵包括六大重點：其一，水系變化沿革。其二，地域形勢利病考察。其三，地區與遺蹟考古之重建。其四，地望的歷代種種變遷。其五，地名的演變沿革。其六，古代地理典籍古地圖考訂。大抵古今來地理學家共喻的歷史地理範疇，以此六項研究為其學科之全部內涵。惟因歷代著作浩如煙海，自亦無須多所舉證。

地理學專門學術的發展高潮，是在清代，它的生活背景講來太佔篇幅，在此無須交代。但是雖然人才鼎盛，名家輩出，實質的成就，仍然以歷史地理為主。若將方志單獨做一門類，則方志最多，其次即是歷史地理。而獨成一門的自然地理，則為量甚少，名家亦稀見。概括以觀清代的地理學，實為充分繼承前代而具有集大成氣勢。

二十世紀中國地理學的起色，原始於民國十八年(1929)政府以命令推動各省編纂方志為初步。接著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而有《禹貢半月刊》的發行。正可代表地理學開新風氣的轉向。這可視為中國新地理學開拓的起點。惟統觀《禹貢半月刊》發行的各期內涵以觀，當可以作為承先啟後的分水嶺。特別是，《禹貢半月刊》的論著，甚至其所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揭示宗旨的發刊辭，大抵仍以沿革地理為重心。此並非空言詆議，試觀其發刊辭所表達，可以說切切實實代表沿革地理立場。在其發刊辭中，言及地理沿革之詞不下九次，言及地理沿革圖者三次，全篇文字雖然提出五項工作目標，而實以沿革地理佔最重要，正可謂充分表達其嚴肅的學術立場。我人可以肯定者，歷史地理的學術繼承與開拓，也正是以《禹貢半月刊》為里程碑，可以清楚的畫出由傳統進至於現代的地理學學術段落，當是無所疑義。

在此特別敘明，《禹貢半月刊》可以代表歷史地理在現代學術中一個開新的起步。而同時在此一時期，所謂1930年代的中國地理學界，則是一個全面開新轉變的分水嶺，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學術分類，地理學自古以來即附庸在史學領域之下。大抵在二十世紀初十年代，清末教育改制之後，中國學術門類有重大擴展轉變，各式學問紛紛獨立呈現。自此打破舊有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史部之下的子目地理門即脫穎而出，自立門戶，與史學並駕齊驅。而地理專業知識，遂亦擴張而加強豐富內涵。諸如氣象學、氣候學、天氣學、地形學、地質學、土壤學、海洋學、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農業地理、工業地理、都市地理（近三十年又有太空搖控地理）。均構成地理學子目門類，充分表現其豐富內涵。而自古傳承以來的地理學主流，僅局限於歷史地理，則相形之下，可見出太過於偏枯。

大抵1930年代以後的地理學家，正是代表我們當代地理學術一個新局面的先驅領袖，適在本人之前一代。其時人物風氣，皆可親身接觸或得自當世見聞。若地質界之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馬廷英、蔡東建，氣象界之竺可楨、朱炳海、黃廈千、朱祖佑，地理界之張其昀、胡煥庸、沙學浚、王益厓、王華隆、洪綏、孫宕越、章熙林、鄭資約、諶亞達、葛綏成、任德庚、賀忠儒、劉鴻喜等。皆為我所見聞的前一代學者，亦適足代表地理學開新自立的學術方向。其大部內涵，自己遠離傳統地理學格局。

回頭再歸趨於傳統地理學中之歷史地理主流，此固然逐漸流於次要地位。實仍保持其向下傳承餘勢。《禹貢半月刊》即是擔當此種傳承重任。在此一門類的重要學者，則有程發軔、譚其驥、史念海、嚴耕望、楊寬、宋晞、程光裕、侯仁之等。大致而言，俱在繼承清代以來的研究風格。若程發軔，專長於中俄邊界之全面研究與訂正。譚其驥則畢生研治歷史疆域圖。史念海研治運河最為全面深入。嚴耕望研治唐代交通最有成就，向達的中西交通地理。鄭德坤之研究《山海經》。岑仲勉的中外史地考證。侯仁之則專志於史前地理考古，楊寬則專治古代都城，凡此皆是聲名卓著，於歷史地理有巨大貢獻。可以見出歷史地理一門，仍有其重大發展，同時是成就輝煌。

至此我必須明白宣述，由於地理學的獨立發展，即在於同一時代之中，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亦產生重大擴張與改變，而有沙學浚先生自抗戰期中，另闢研究新途徑，開啟其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這一新創格局，值得我們地理學界共同參考比較。沙學浚

先生所著：《中國歷史地理》，初版於民國三十六年刊於上海<sup>1</sup>。代表其在此一學門領域的建樹，可以肯定相信沙氏對此門學問的自信與自承。不過有關沙學浚先生的歷史地理研究，在其一生著作中，自不能以此小書為限。我人願作一個大致輪廓介紹，可以分章演述於後。

## 二、位置價值論

在對日抗戰的艱鉅環境下，沙學浚先生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無不與國防意義聯帶思考，因是而最先自國防地理入手。其在抗戰期中的大部研究論文，最後結集成《國防地理新論》一書，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出版，可惜此書今已經絕版<sup>2</sup>。

沙學浚先生最早提出其位置價值論，是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二月十八日，刊載於《大公報》的〈戰國〉專輯第十二期，當時文中稱做「地位價值」，後來改訂為「位置價值」。我人於此可以推見沙氏的理論建樹，可以保守的定名創說年代，適當於抗戰時期，與同時興起的戰國策學派有近於同流。而今世大陸學者搜輯戰國策學派的論文集，並未收錄沙氏的各樣論文。不知出於何項標準考量。然而並無損於沙氏的學術開新，抑且正能表現地理學家的獨立領域與卓越創造<sup>3</sup>。事實上，沙氏的學說言論，實是固有治歷史地理者向所未見，亦聞所未聞。卻不知此正是一個學術開新路的先導，狃於俗習成見者，不免漠視其存在。

沙氏面當對日抗戰及二次世界大戰正慘烈的艱鉅年代，其表達位置價值論，即就人人最關心的國防問題入手，其位置理論即藉國防意義而顯明。且在歷史地理的宗旨而言，這也是最重要的課題。看沙氏表述位置價值在國防上的意義：

國家是一個生活體，同時也是一個國防體。國防體之構成，要靠首都與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的國防要點相互間的有機聯繫與自由活動。據此，則一個國防要體的位置價值，不當僅從小範圍的區域地理的形勢上加以認識與評估。只有在全體中纔能找到部分的位置、作用與價值。由此引伸，則曉得國家不統一，在地理上無由成為健全的國防體，無由充分實現它的可能性，而不能適宜於「國防第一」的大時代中的生存<sup>4</sup>。

沙氏提出向不見於固有地理著作的新概念，申明位置(position)是地面上實有的據點，而位置價值則是一個思考的概念，說明『它的存在與重要只能思想到、意識到的』。

<sup>1</sup> 沙學浚著，《中國歷史地理》，上海，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台北，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三版。

<sup>2</sup> 沙學浚著，《國防地理新論》，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六年印。此書原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有藏，作者學生時代曾閱讀，此書熱門，同學中無不爭相借閱，每人均能獲致深刻印象。

<sup>3</sup> 溫儒敏、丁曉萍合編，《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第一版。此書搜輯論文四十餘篇，未嘗收錄沙學浚任何文章。

<sup>4</sup> 沙學浚著，《地理學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印，頁七。

換言之，任何位置價值都是地理學家以至政治家所賦予的一種評估。對此基本認識，沙學浚先生有清楚說明：

任何地方或區域雖有其確定的位置，但不一定都有位置價值，位置價值是根據人文地理學的價值判斷而確立的一種評定。人文地理的位置價值又有種種不同：有經濟地理的，有交通地理的，有聚落地理的，有政治地理的，有國防地理的。各種位置價值間之關係十分密切，但不一定完全符合，有時且至互相衝突。例如在此海洋時代，山海關之位置價值在交通地理上是優越的，在國防地理上則不佳<sup>5</sup>。

毫無疑問，沙氏所提出一個位置價值的概念，在地理學學術史上是全新的理論。而在沙氏申說其功能意義，則明白指出，中國古代早有相類的覺識，並且善加利用。故沙氏列舉戰國時代縱橫家蘇秦、張儀、范雎等遊說列邦，陳說利害，俱多表達在列國爭雄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於位置價值有深刻評估，與今時的位置價值論多相合契。沙氏在其文中，已充分詳加舉證。

現在可以拿出沙學浚先生對於位置價值論的實際應用。他舉1941年德軍進攻蘇聯的入手重點，用以見出位置價值所在：

一個區域的位置價值須由該區若干地點，有時須連同該區附近的若干地點的位置價值決定之。去年德國攻蘇，其目的之一在佔領烏克蘭，因烏克蘭在經濟地理上，政治地理上以及國防地理上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在作戰計畫上，卻是以佔取敖得薩，基輔，列可拉耶夫軍港及卡爾科夫等城市為第一的直接目標；因為得到了這些具有位置價值的地點，便可控制全部烏克蘭及相與聯接的黑海沿岸<sup>6</sup>。

同時沙氏亦就中國領土指證一些地方的位置價值，用以表達其理論的周遍性：

有許多關隘(pass)交通位置是阻礙，在經濟地理上復無價值可言，但是在國防地理上卻是非常重要，例如甘肅之嘉峪關，秦嶺之大散關，四川之劍閣，河北之居庸關。新疆北半部（天山以北）經濟要區在伊犁一帶，政治中樞在迪化，國防地理的重點則在（一）齋桑泊至額爾齊斯河上游，（二）伊犁河谷及（三）艾比湖至阿拉庫爾湖(Ala-koul在俄境)之走廊，這一帶西人稱之為準噶爾門戶，為亞洲民族遷移必經之路，成吉思汗西征即道出於此，國防地理上最擅重要<sup>7</sup>。

凡此俱可表現位置價值論在地理學上的通識，實具有理論實際的一致性。

由於在對日抗戰時期的因應的思考，沙先生所表達的位置價值理論，多半集中於國防地理領域。顯見學者用心於研考事理，亦無不與其所當時勢有密切關聯。沙氏提示其地理學上的位置價值論，開宗明義，即為國防而立言：

<sup>5</sup> 沙學浚著，《地理學論文集》，頁二。

<sup>6</sup> 同前引書，頁五。

<sup>7</sup> 同前引書，頁五～六。

從國防位置的觀點看一國的國防，便是要把一國國界（包括本國的及海外屬地的陸界和海界）上有國防地理的位置價值之地點（由地點構成地帶），消極的設防與保護，不使淪陷於敵國之掌握；積極的要利用這些地點作根據，以爭取敵國的有位置價值的地點與空間，以便更可充分地保障本國之歷史發展與國防安全<sup>8</sup>。

在此必須進一步申說明白，在中國固有的歷史地理傳統中，有所謂形勢論的一門學說，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域紀要》，沙學浚先生並非不加參考閱讀，但直接表明，不能蹈襲這些陳說。他無意於就形勢論的舊巢，來研析今日的世界地理形勢。由於世勢嬗變，今昔不同，地理形勢亦須因應現實而採行周遍而有效的學理<sup>9</sup>。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沙學浚先生提出其位置價值理論，代表學術史上「歷史地理學」一門的重大開拓。此次不過是闡述理論，嗣後沙氏更又利用此一理論，發表一些重要論著，如「古今戰爭中的希臘」、「光榮孤立之英倫」、「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國都之類型」、「南沙群島與太平島簡介」，以及「新加坡國之地理特徵」等。俱多表現其位置價值的觀點。

### 三、空間價值論

沙學浚先生當初發表位置價值論，在同一文章中同時提出空間價值這一概念，惟並未作進一步詳細交代。但我人可以充分了解，沙氏的空間價值論，當自此時已同時思考成熟，只因在探討位置價值的專文之中，不能延伸題外，更對空間價值也一併詳細論述。以免喧賓奪主。更確切的證明，實可參閱沙氏的若干有關空間價值的地理論文。

沙先生的地理學研究，應用空間價值理論之處，有很多精彩論文。我人自然可以從中一一檢證其學理的表達。

其一，關於全世界經濟空間之統觀分類。沙氏區分之有十大類型：1.遠離世界市場的原始經濟型。2.有原料供應世界市場的原始經濟型。3.自給的草原游牧經濟型。4.綠洲經濟型。5.有近需工業和國際原料供應的農業經濟型。6.有近需工業和殖民統治的原料供應的農耕經濟型。7.熱帶殖民地經濟型。8.移墾殖民地經濟型。9.原料補充區經濟型。10.工業空間經濟型<sup>10</sup>。地區空間價值，是人文現象與自然背景結合，因是代表現今世界的一個明顯時段，前代並非如此，以後勢必又有變化，故而正確的應屬於歷史地理領域。其實，這樣的判析描述，只代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間的世界動態。

<sup>8</sup> 同前引書，頁一。

<sup>9</sup> 同前引書，頁一三五。「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sup>10</sup> 同前引書，頁一五六一一六八，「世界經濟空間之類型」。

三十年來已有重大改變。

其二，就當今世界現勢，強大國家憑藉。沙氏相信自十六世紀以來，四百年來形成海權世界，由於海上船艦的利用，乃使世界脈動主流，令海洋國家佔盡機先。因是沙氏專就海洋空間，判析今世海權國家之類型。首先沙氏以六個海洋優先條件，用以定出海國資格。1. 海洋交通，2. 海外貿易，3. 海洋漁業，4. 海外移民，5. 海外屬地，6. 海洋控制據點。大抵一國的經營重心在這些方面有一定的偏重，即可視之為海洋國家，可以稱之為海國。沙氏乃將之分別為四種類型。A. 航海為生的海國，實際代表則指中古的阿拉伯人，近世的挪威與希臘，當然英、荷、日本亦不在外。B. 控制海洋交通位置的海國。實際代表則指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C. 轉口海岸的海國，實際代表，沙氏多指一些轉口大港，實則具標準型者應是香港和新嘉坡。D. 島嶼的海國，實際最具代表性的為英國、日本以及冰島。就反一方面比論，沙氏明白指出：「一國海岸線不論如何之長，臨海位置不論如何優越，如果海洋交通海洋生活不重要，不得稱為海國，只是大陸國。」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國與印度<sup>11</sup>。

其三，從亞洲空間價值看亞洲歷史發展，沙氏指亞洲歷史動力的主角：農業、游牧、海洋三種民族同等重要。並說明亞洲古文明，擴大亞洲文化的世界化，充實了亞洲歷史的內涵。而海洋活動，可以擴張至印度洋與太平洋全部。惟海洋歷史常被人忽略，更生出諸多曲解。最大的缺憾是北亞於十六世紀後為俄人入侵，是亞洲史上的重大失敗<sup>12</sup>。

其四，就中國自南海以至北亞地區，地理上人文分野，形成南半為富庶的農業景觀，北半則於大漠分隔蒙古草原上為游牧景觀。天然形成定居的農業經濟空間與廣闊高原上游牧空間，自古以來為兩大不同空間的對峙，一直是中國歷史推移的原動力。沙氏就其空間價值分野，深入探討自古代以至近代所展現的農業空間與牧放空間兩大族類彼此推移的史跡。其命題為「從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馬」。確定指出歷史的巨變，每必以胡人出於主動。特別是經濟因素，迫使胡人驅兵南下。沙氏比較彼此特長，以確信胡人多佔優勢。申理至足服人，至其所謂廣義之胡人，則包括殷周時的鬼方、薰粥，漢時匈奴，魏晉之鮮卑，唐、宋之契丹，宋之蒙古。以至明清。均表現出中國歷史的動力根源。沙氏此文是其生平中最受學界稱許崇重的著作。表現其一篇論文籠罩二千年間的歷史動力的掌握，真是學術上重大貢獻<sup>13</sup>。

其五，沙學浚先生固自空間價值的不同，研析中國歷史發展動力，與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長期衝突。自是澄清千古史乘流趨。使人明見通識。惟其可就同一論點，總觀

<sup>11</sup> 同前引書，頁二四八—二六五，「海國之類型」。

<sup>12</sup> 同前引書，頁二〇〇—二〇五，「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頁一九三—一九九，「蒙古征俄之地理背景」。

<sup>13</sup> 沙學浚著，《中國歷史地理》，頁一一七。

中國史上歷代喪亂，不談恢張之盛世，專考動盪之末季。由此入手，考察中國歷代承受外力衝擊，而在地理空間上的全面流動，以見出歷史演變的根本動因。此是前人向來所未及思考與用心探討的重大問題。沙氏於此重大思考，提出「南渡時代與西遷時代」以總括中國遭受外力衝擊，舉國喪亂，遂乃提出其解析之管鑰。亦正是其空間價值論的表達。此作寫於抗戰期中，正亦表現其在喪亂環境中的重大啓悟。沙氏總括中國全部動盪歷史，畫分出南渡時代：包括永嘉大亂後晉南遷而長期退守江南。北宋徽、欽被虜後、南宋的偏安杭州，以及明末崇禎殉國後，福王、桂王、唐王、魯王的避地南陲。實佔千年史乘。沙氏更就鴉片戰後海上強敵的衝擊，迫使清廷一退熱河承德，一退西安行在。而當前日寇的入侵、國民政府的退守重慶，俱亦表現百年來的西遷。而命稱為西遷時代。於此建立全面通識，真是前無古人，亦足啟發當世<sup>14</sup>。

其六，同樣探討中國歷史全局，沙氏仍以空間價值論點，把主體史乘畫分為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兩個不同空間表現其不同歷史重心。西安時代包括周、秦、漢、隋、唐各代達千餘年之久，北平時代則包括遼、金元、明、清各代主政達千年之久。全部史乘納入於一篇文章之中。探討各代盛世的維繫之條件背景以及經營規畫。亦如前述各文，俱是網羅全史表達通識。沙氏研究，提出其約化的精闢要義。可附舉如次：

凡欲統治全中國，須能解決兩大根本問題：一為控制中原，並由控制中原以控制中國本部。一為控制長城線（從遼東到河西），以抵抗胡人，經略塞外（指遼北、漠北和西域）。就北方入侵民族立場言，則為先得長城線，而後控制中原。從長城線到中原，必須通過河北或關中，故河北與關中，適位於中國政治地理的均衡點上。而北平與西安遂因此而獲得至高的地位價值<sup>15</sup>。

統觀沙學浚先生之以地理學觀點，研治歷史，特別是以空間價值論處理重大史實，俱能突出格局，邁越前人，洞察歷代，提出嶄新見解。在學術界，亦表現獨具特色，自闢蹊徑。足以成為不刊之論，為後世法。

#### 四、線界價值論

沙學浚先生未嘗專論地理學上的線界價值，但卻在大學課程開授「邊疆地理」。我也正是親受教誨的入室弟子，確曾領悟其發揮線界價值的講章。沙氏講授「邊疆地理」，首先申明兩個英文字義。一個是boundary，一個是frontier，前者表明的國境界線，後者表明邊疆領域。在「邊疆地理」中兩者俱必為研討重點。實是專門深入探究邊緣和邊區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邊疆地理學課，正是要發揮線界價值的一個地學領域。

<sup>14</sup> 同前引書，頁一八一四六。

<sup>15</sup> 同前引書，頁五一。

邊疆地理，只能代表線界價值一部分功能之研析，雖然是地學上重要科目，卻不能網羅線界價值的全部內涵。關於邊疆國界的著作，沙氏只有一篇論文：「中印國界在喜馬拉雅山東段南麓」<sup>16</sup>和一篇通訊：「中韓之間的鴨綠江國界」<sup>17</sup>，於此之外，則在中國四鄰的國界線問題，實是複雜多樣而內容繁富。沙氏講述重點多在於邊區的廣闊地域，而少涉於邊界線的討論。

就線界價值以講述邊疆地理，其用途只局限在國界之線與邊防地帶的區域。自不能在地理學上表達線界價值所涉及的各種情況。在此邊疆問題之外，如討論長城即不必放在此一範疇。長城是一個文化具體結晶，內涵複雜多樣，不能單純用於邊疆地理一端。抑且此是一個歷史地理的中心問題，在歷史地理的學術領域必須成為專門的長城史，屬於一個文化、經濟、政治、建築、交通、軍事以至民族爭生存的全面綜合研究的一門學問。不過就線界價值言，沙學浚先生有單獨一篇論文。命之為「從地理觀點看長城」<sup>18</sup>。他並不在邊疆地理課上講述長城。長城純粹是人工所造，代表古人智慧毅力。而單單用線界價值討論，實代表一種獨特的人文地理景觀。要澄清其位置所在，基本結構，經營與維護，防守與利用，並及其對於歷代以及今人的影響。評估線界價值是十分繁複。沙先生只考證其位置形勢與創建歷史，並未更有進一步分析。已是四十年前之事，近二十年有較詳細的歷史地圖，出於譚其驤的研究繪製，並有不少人親自考察履勘長城遺址。並作長城各段之復原研究，這些學者如顧頡剛、陳守忠、王重九、馮永謙，提出更多詳細而切實研究論著。使人更能增強認識。故沙先生的理論更可以取借，並加發揮。線界價值論，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在中國歷史地理一門學術，沙學浚先生本有諸多開拓，而其最見突出而獨步地理學界者，則在於沙氏對綠洲的研究，即當世地理學界沙氏實開風氣之先，近時得知大陸上有黃盛璋、王炳華、穆舜英、齊陳駿是多年研究綠洲地理，自是專門名家。但黃氏本之綠洲地理實察，以考古為重心。沙氏則重在綠洲連索的一個連線，重在一個連續延長的交通線的線界價值。兩者有重大歧異。沙氏的著作有「樓蘭綠洲的存廢與漢唐經營西域之路線」<sup>19</sup>。其文章重點實在於西域的一個通道，亦即一條路線。即今時所謂之絲道是也。沙氏研析漢唐兩代經營西域路線之不同，與樓蘭綠洲的存廢有關。表達一個沙漠中綠洲對於維繫交通線的重要性，申敘解析，鞭辟近裏。樓蘭早廢，造因於羅布泊的乾涸，水源斷絕，唐代已不存在。但凡由河西以至西域，一路全恃連串綠洲結成路線，在乾燥地區之西域，實是重要生命線。充分代表線界價值。凡若研究貫通中亞的絲道，勢須一一研考絲路上的大小綠洲。沙氏以此理趣入手，自遠邁前代之孤立研究。而其地理

<sup>16</sup> 沙學浚著，《地理學論文集》，頁三〇九—三一三，「中印國界在喜馬拉雅山東段南麓」。

<sup>17</sup> 同前引書，頁二四六—二四七，「中韓之間的鴨綠江國界」。

<sup>18</sup> 同前引書，頁一四七—一五五，「從地理觀點看長城」。

<sup>19</sup> 同前引書，頁一八〇—一九二，「樓蘭綠洲的存廢與漢唐經營西域之路線」。

學上的開拓，尤當崇重學習。

單就中國歷史地理而言，線界價值的應用尚不止上述三種論域。即地學上所謂的走廊地帶，也是必須開拓，世界著名的河西走廊，相當於絲路的東段，綿亘一千餘里，是即漢武帝開闢的河西四郡，可以承接西域綠洲，但於地學上是獨特的走廊地形，須予專門研究。研究走廊專家，大陸上有陳守忠、齊陳駿、蘇北海、趙永復等，都以河西走廊為主。而尤宜採用線界價值討論。只是沙學浚先生並未留下這類的研究。本人為其門人弟子，追隨先師，願意補述於此，以免遺漏。除河西走廊之外，尚有遼西走廊和花東走廊（台灣東面自蘇澳南下過花蓮到台東為綿延數百公里的走廊地形。國人少有研究。）在我的學生時代，早已熟聞花東走廊之地學知識，是我們欽羨的地質寶藏，我們曾為地質學一課親履其地，並且在畢業旅行時專選這一條路線踏訪。決計走完全程，從屏東返回西線。

我們所最感遺憾的，沙學浚先生生平做歷史地理研究，卻未嘗寫任何專論討論運河。尤其就線界價值觀點研究運河，可以在前述四個領域之外開闢一個廣闊天地。亦如中國固有的長城，運河也是一個文化體，是人類改造天然水系的重大成就，其內涵相當複雜而豐富。更重要者是中國南北經濟動脈，北方半部山河的生存後援。在歷史地理上佔重要地位。沙氏不作研究，可能因同時期有全漢昇先生寫出專著：《唐宋帝國與運河》，這在我們學生時代，是搶著閱讀的熱門之書。我早已拜讀全書。沙先生即因已有重要著作名家，就無須自己再研究。然站在歷史地理研究而言，不可留下一個大空檔。我故在繼承之中，授課必詳細講述運河。

五十年來與我同時的當世運河名家，人才輩出。除全漢昇以外，最重要的有史念海，著有《中國的運河》一書，包羅更為全面，自是一個權威著作，具永久參考價值。其次有朱偰所編《中國運河史料選輯》，同樣重視隋唐宋運河的名家尚有：潘鏞的《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張崑河的「隋運河考」，許輝的「唐宋運河論述」，與「歷經滄桑的江南運河」，何榮昌的「唐宋運河與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朱瑞熙的「大運河和唐宋帝國的統一」，劉德岑的「先秦時代運河沿革初探」，魏嵩山、王天楚合著的「江南運河的形成及其演變過程」。在台灣除全漢昇以外尚有一位重要名家，即吳縉華的《明代海運及運河的研究》，大陸研究明清運河者亦復不少，有楊正泰的「明清時期長江以北運河城鎮的特點與變遷」，郭黎安的「裏運河變遷的歷史過程」，鄒逸麟的「山東運河歷史地理問題初探」及「淮河下游南北運河口變遷和城鎮興衰」。當然這類運河研究，仍在發展之中，本文舉其大要，而遺珍自所難免。總括所見，以為可資參證者已相當豐足，自足以彌補講授線界價值的諸項論證。

運河表現一條或多條水系線道，在中國史上比絲綢之路的水陸兩道更為重要，更為悠久。據可考的記錄，早見於紀元前七世紀的楚莊王時代，而後繼有吳王夫差疏浚的胥

溪、邗溝、黃溝。在古史上一向著名。自秦漢以後，歷朝無不利用運河，直至清末，自是國家經濟動脈。也是一個極複雜的歷史論題，尤其就歷史地理科目內涵，豈可忽略運河的研析。所幸研治學者群趨，本人可能參酌補充這一重大論域，自以線界價值處理運河問題。

## 五、結論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亦即抗戰時期中，民國三十一年起，沙學浚先生在中國地理學領域開創其歷史地理一門的新理論綱領。本文已分別各章目予以介紹。可以會觀比較，於前人之研究地理門類之傳統，顯見是新創格局。站在學術立場評估，自是重大開拓。站在地理專業門類，亦表現一門家法的學術開宗，一代開山宗師的獨闢先路。

沙學浚先生的歷史地理學著作，開始發表於抗日戰爭時期，這也是時勢背景使然。在抗日戰爭的艱困環境中，當時知識界敏覺之士對於所面臨存亡生死關頭，有諸多深切反省。危困貧迫之中，仍能提出其民族振興，因應世勢的呼喚與主張，正見出黑暗痛苦中，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故而在抗戰各地區均存在有卓越出色的鬥士與促發自強的各樣文字。其中較具體而實能代表知識分子責任使命的言論行動者，則最當重視此全程時期中的一個戰國策學派。現可略述於後，以略見其梗概。

簡單介紹：戰國策學派的形成，正代表抗日戰爭的思想言論。事因林同濟、陳銓、雷海宗、賀麟等教授，在民國二十九年(1940)在雲南省發行《戰國策半月刊》，隨後又在民國三十年三十一年在重慶《大公報》開闢〈戰國〉副刊。先後所載論文，多是反省中國民族文化的存續問題，與因應西方文化武力侵迫的種種設想意見<sup>20</sup>。

我們充分肯定戰國策學派的時代代表性，更十分欽佩其所發抒的言論與判析，敢說是永世不可磨滅，值得今世參考。惟所見沙學浚先生同時期在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上發表其重要歷史地理論文，其性質尤符合戰國策學派的精神理想，但今世出書，無論選文或目錄，均未收入沙氏任一文章。在此並無責備編者之意，惟可說明者，在同一時勢背景下，不單是一個學派人物的共同心聲，而具有同樣胸懷眼光者，亦所在多有，故奉告大眾，不可以學派立場而掩蓋他類賢者的貢獻。

若就學術內涵取觀，容易看出沙學浚先生不同於戰國策學派諸公之處。我人可以通觀雷海宗、林同濟、陳銓、賀麟等論文，其立場是對前代談論新文化者的反思與抗辯。其用心在於民族文化自保自立，自愛自尊，並同時思考抵抗西方文化、思想、政治、軍

<sup>20</sup> 溫儒敏、丁曉萍合編，《時代之波——戰國策學派文化論著輯要》，頁四二四—四三一。備列戰國策學人著作八十八篇目錄。包括重要學者：雷海宗、林同濟、陳銓、賀麟、郭岱西、陶雲遠等的論文。自足代表戰國策學派主流人物。至於本書所選錄的文章共有四十三篇。如此數量，已足夠代表一個學派的大致內涵而綽綽有餘。

事的侵略。雖然明顯指出所當時代為戰國的重演，實甚可直就歷史與地理討論中外現勢。而沙學浚則更加具體明確以中國地理條件研討歷史問題，以至於眼前的世界上戰國形勢。自更具有說服力，而切近戰國策學派宗旨。但我人必須在此澄清，一來沙氏未嘗自視為戰國策學派，二來就地理學領域而言，沙氏是自創格局，無須附庸於一個思想流派。同樣具時代意義。然而鳥獸不可以同群，自仍須各走各路。我做第二代繼承的門人弟子，決不願由後人為沙師亂貼標籤。

環顧八十年來中國學術界的創造，林林總總之成績，而以表現大氣魄，宏觀議論研討者，惟沙學浚首屈一指，統計其宏觀論著不下二十餘篇。如其「從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馬」，「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南渡時代與西遷時代」、「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從亞洲空間價值看亞洲歷史發展」等等，均表現其統觀全局，貫通古今，自可為宏觀論著典範。我為此論斷，皆有所本。學者儘可取來本時代各名家各樣論著，大可品評誰足以擔當宏觀大師。

沙師謝世已將及一年，我輩後學追隨，除其前期者如賀忠儒、劉鴻喜外，多為我前後同學，宜其應有後繼者。抑亦不在少數，所知在美國著名者有徐美齡、李作華。在英者有佟秉正。在台者有陳國章、陳國彥、蔣達泉、史光華、石再添。惟其能繼承沙師之歷史地理一門學術者，則以陸寶千為最早，於三十年前已著《中國史地綜論》一書。其次則有姜道章最為精博而全備。姜道章教授在民國八十五年(1996)二月二十五日發表其「歷史地理」學綱領十四目，特略開如次：

1. 政治疆域的變遷
2. 地理發現與探險
3. 古代方志
4. 地理對歷史的影響
5. 歷史對地理的影響
6. 過去地理的重建
7. 不同的連續文化層景觀
8. 古今地理的變遷
9. 地理變遷的過程
10. 對過去地理的回顧
11. 歷史地理遺蹟的研究
12. 對過去地理的識覺
13. 歷史地理模式
14. 歷史地理的理論

本文之作當可附在姜教授的第十四類。至於我個人的繼承，是多年來在大學講授

「方志學」及「歷史地理」兩課。我自可勉強附驥於地理學之末。要寫此文紀念業師，也是一百個應該。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寫於台北